

东亚秩序、朝核危机、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重建、达尔富尔危机、印度崛起、俄格冲突、南海问题、两岸互信……全景式反映冷战后国际战略热点问题。

主 编 ○ 郭伟华

副主编 ○ 韩 凝 曾 勇

一本书读懂国际热点问题！

THE LOGIC OF CRISIS

危机的逻辑

冷战后国际热点战略分析

新 华 出 版 社

主 编 ○ 郭伟华

副主编 ○ 韩 凝 曾 勇

一本书读懂国际热点问题!

THE LOGIC OF CRISIS

危机的逻辑

冷战后国际热点战略分析

1025591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的逻辑/郭伟华, 韩凝, 曾勇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66-0182-2

I. ①危… II. ①郭… ②韩… ③曾…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748 号

危机的逻辑: 冷战后国际热点战略分析

主 编: 郭伟华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贾晓伟 张 程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182-2

定 价: 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5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处理朝核危机的战略比较分析	30
第三章 中日东海危机的地缘政治困境	45
第四章 两岸建立军事安全互信的历史启示	63
第五章 南海问题的危机化趋势及应对策略	79
第六章 俄格冲突的国际战略背景	99
第七章 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挑战及其前景	116
第八章 印度的亚太战略和大国关系	134
第九章 从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困境看当下中东变局前景	149
第十章 中国参与处理达尔富尔危机的战略回顾与反思	164
第十一章 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运用	189
后 记	209

导 言

国际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紧张、相互对抗的一种状态。这种紧张状态虽然在对抗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低于激烈的战争状态，但也明显区别于正常情况下国家间相互合作、良性竞争的和平关系。国际危机一般由一系列关联事件构成，在时间轴上呈现出危机参与国之间博弈互动的过程，国际热点、危机、军事对峙、武装冲突等概念均是这一过程的不同表述。自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危机一般是作为战争的前奏和附属而存在。但“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以后，战争受到越来越多的抑制，危机逐步演化成为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独立形态，甚至是一种常态。

国际危机管理是危机参与主体对国际危机进行介入调控的行为过程。国际危机管理当中的“管理”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有所不同，它不是单一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施加控制、施加影响的单向行为过程。相反，国际危机管理是多个管理主体之间相互施加控制、相互施加影响的行为过程。本质上，国际危机管理是多个国家主体之间的对抗博弈，国际危机是多主体之间博弈互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状态。随着危机越来越普遍化和经常化，战争越来越特殊化和极端化，人们逐渐将这种状态称为“国际危机”的同时，将这种状态下国家所作的选择和行为称为“国际危机管理”。现代国际条件下，国际危机成为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当中所经常面对的“棋局”，国际危机管理自然也就成为国家维护自身权益所必须学会的对弈方式。

实践需要引领理论升华。国际危机的纷繁复杂，国际危机管理的刀光

剑影，自然吸引无数才智试图透过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外表，洞穿国际危机的内在机理，掌握国际危机管理的驾驭之道，国际危机及其管理的学说应运而生。发展到现在，国际危机管理学说大致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其各自重点和角度类似于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分野。好比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国际危机管理的微观学说一般将研究重点放在危机行为体的单元层次，注重探讨危机参与方的博弈过程和决策选择，甚至深入行为体内部来探求危机参与方的决策机理。好比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国际危机管理的宏观学说主要将研究视线放在危机行为体所在的国际体系层面，侧重探讨危机形成乃至危机行为体决策选择的系统动力和格局缘由。

国际危机管理学说的专业化发展，无疑为国际危机管理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成果和工具，但它并没有相应带来国际危机管理实践水平的提升。国际危机管理实践中，实践与理论相脱离的情况严重存在。理论上，因为国际危机管理作为研究客体太过复杂，可以将其化繁为简，就某一层面、某一角度、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主要取决于研究主体的视角、重点、方式方法等因素。国际危机管理学说划分为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正是源于研究主体自身的视角和逻辑。实践上，一定意义上说实践是对理论的综合应用，像国际危机管理这样复杂的社会实践更是如此。分析和解决国际危机管理的任何实践问题，都可能综合用到国际危机管理的各种学说。但是国际危机管理学说的专业化发展并不都能为国际危机管理实践所用，理论上恐怕有其自身的原因：比如国际危机管理学说发展得太专业化、太精细化，反而难以被实践者所接受；再如研究某一学说太深入，反而容易以此为透镜来单向认识问题，结果忽略了实践的复杂性、多面性，使得认识难免流于片面。

理论是单维的、线性的，实践却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解决国际危机管理实践与理论相脱离的情况，在实践层面可以利用智库机制、科学决策等体制机制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无论是何种的体制机制，归根结底是人的思维在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从事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者，还是国际危机

管理的研究者，二者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相反，他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待理论和运用理论都需要遵从共同的认识规律。首先，需要承认理论的有用性。理论是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为我们探索前进道路提供了借鉴。无论是看情况，还是办事情，都需要借助理论的力量。其次，要以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认识论。如果过度陷入理论，容易违背认识论的基本规律，拿理论为本本、为教条，这无异于削足适履。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思路，本书就当前部分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就每一章所针对的具体问题，本书可能无法给出完备的说理和准确的结论。但本书试图通过每一个问题的分析过程，传达本书作者们几个粗浅认识。第一，国际热点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就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议论，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理论积累、历史纵深，还需要有政治立场、站位高度、阅历感悟等基本素质。如果不具备这些要件，讨论国际问题不是容易盲从，就是容易偏激，看待问题会缺少理性的深邃。第二，单一的理论不可能完全解释国际问题复杂的现实，分析国际问题是对理论的综合运用，这不仅需要我们先看问题、想办法不能走本本主义，更需要有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指导，否则不是陷身于理论，就是迷失于现实。第三，国际危机管理本质上国与国、人与人的对抗现象，理论化成果可以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而非全部问题，人的因素、非理性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这类问题的分析不能仅靠机械地推理演绎。这几点认识，本书的认识能力肯定是远远没有达到，但它们却是本书分析过程中所努力追求的认识境界。

另外，本书还在追求着战略的高度。国际危机管理作为国家对弈方式，当然要有战略，就像战争离不开战略一样。什么是国际危机管理的战略问题，什么又是国际危机管理的战术问题，二者之间的区分恐怕要比战争中战略与战术区分更加模糊。人们经常讲“大局着眼，小处着手”，大局能体现战略，小处也照样体现战略，关键看是否有宏观的眼光和全局的站位。本书主旨在探讨什么是国际危机管理的战略，当然对这样的问题也

未完全明了，但是本书在分析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尽量以宏观的眼光和全局的站位跳出细枝末节的羁绊，寻找出问题的主要枝干。战略高度无限，但作者们的眼光有限，功力有限，思维水平亦有限，本书所追求战略的高度，只能说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第一章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冷战结束后，东亚危机事件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南海主权等问题上出现纠葛；后有韩国“天安号”事件引发半岛局势紧张，乃至朝韩之间剑拔弩张；又有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争端加剧，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不断纠纷等。2011年年初一度由利比亚战事等外部事态有所转移的东亚紧张局势在下半年又生波澜，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事态。但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如此频发的危机事态竟没有一次擦枪走火，由危机失控引发大规模冲突。我们知道，历史和现实当中危机引发大战的事例俯拾即是。相反东亚却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亚太还是第一次五十年不闻枪炮。整个区域是和平的。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与非洲、欧洲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在冷战后没有带来和平，反倒是新一轮的对抗和暴力形成了恰切的对比”。^①

东亚地区何以出现此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状况？东亚危机又将如何演绎？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旨在初步搭建分析东亚危机事态的宏观框架。

^① [新加坡] 许通美著，李小刚译：《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一、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历史脉络

地区秩序是一定区域内国家在相互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则是指“用以支持国际社会或国家之间基本或首要目标得以实现的一套行为规则和模式”^①。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国际秩序能够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本要素是各国集体共享的共同利益、一致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解决相互矛盾的协作机制^②。它的实质是各国就相互关系所共同认可的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这种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的根本作用 and 理想目标是在有序状态下各国相互间实现地位与实力的一致、责任与地位的适应、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从而保证各个参与国能够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享其利。^③

对照地区秩序的基本内涵，从冷战延续下来的，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并未充分适应和吸纳冷战结束后的各种新变化，达成东亚各国所共同接受的、井然有序的地区政治安排。除美、日等作为既得利益者对轴辐体系表现出很强的维护性以外，东亚区域内各国，包括日本等现有秩序的维护国也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建设“东亚共同体”^④愿景规划，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新旧嬗变的转换期。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进程仍是步履维艰。在经济发展领域，目前东亚有“10+1”、“10+3”、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多种多边合作形式，大多都处于机制性对话和论坛层次。其中进展最快、最具实质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只是中国

① [英] 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三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

② 同上，第 62—73 页。

③ 关于地区秩序的含义、类型等理论内容的探讨可参考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1 期，第 7—21 页。

④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明确提出始自 2001 年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东盟+中、日、韩（简称“10+3”）领导人会议提交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 2001》。

与东盟就双方经贸议题达成的一致^①。此后，韩、日、澳、新等国争相围绕东盟建立自贸区，却难以直接汇集成区域统一的自贸区^②。这说明东亚各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即使在合作性较强的议题上仍心存芥蒂、矛盾重重。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近年来不断强化，表现出旧有秩序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但旧有秩序的保守性越强，越是在一定程度上裂变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合作，嬗变出新秩序的进程越是艰难。比如中国所倡导的涵盖地区所有大国的“六方会谈”，作为讨论半岛问题的协商平台，目前几陷停滞，在此基础上能否发展出多功能安全合作更是前景黯淡。综合来看，处在新旧嬗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远未就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性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新秩序结构尚未成型，东亚地区秩序目前总体处于“有气无力”的基本状态。

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状况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对比更加明显。目前西欧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统领地区安全事务，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整合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北约和欧盟原成员国为班底不断吸附外围国家的地区秩序形态。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设立了成员国共同的“总统”和“外长”，标志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统一性进一步提高。有学者评价“开始于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区域化运动最为成功的典范。欧洲联盟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就是其标志。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使区域

① 根据2002年11月中国、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此后相关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建成。

② 韩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分为商品贸易协定、服务协定和投资协定。双方自2005年2月开始进行有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两项协定已分别于2007年6月和2009年5月正式生效。2009年6月韩国与东盟特别峰会上，双方签署投资协定标志着结束4年多的谈判，最终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由此双方将不断发展为更具实质性的贸易共同体。日本迟至2005年4月才与东盟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举行双边谈判，期望在2012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2009年2月27日，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十国的贸易部部长于第十四届东盟峰会期间，在泰国华欣签署协定，正式建立“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

成为统一的经济体，而且正在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和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①。正是有了相对成熟、稳健的地区秩序，欧盟成员国内部基本消除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在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向域外伸展力量。^②

相较欧洲而言，“有气无力”的东亚地区秩序虽勉强避免了大战的破坏，却无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机，致使东亚频繁、反复地遭受危机震荡。说东亚地区秩序“有气”，是指东亚一体化进程具备聚合的内在动力。“经验证据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评者认为的或者许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会内化。”^③在此背景下，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都不愿或不敢逆流而动，以战争扰乱乃至中断东亚聚合进程。说东亚地区秩序“无力”，是指目前东亚地区秩序不足以理顺和协调域内各国在实力、地位、责任和权利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各国不得不在较高程度上依赖于“自助”原则解决相互矛盾。无论是现有秩序的维护国，还是现有秩序的改造国；无论是原有的强权国，还是新兴的后起国；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地区小国都在积极谋求未来秩序下的自身优势和一定主导权。在此过程中，不同情况、不同诉求国家之间的相互摩擦、碰撞乃至冲突在所难免。“今天的亚洲大国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基本上仍无组织的地区环境中运行，在那里缺乏人们目前在欧洲甚至在拉美都能看到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框架。”^④东亚地区秩序嬗变期中的“有气无力”，就造成了当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基本状况。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

① 赵怀普：《欧洲一体化经验及时代精神》，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77期，第52页。

② 2010年以来欧盟对主权债务危机标本兼治，截至目前虽难断言已见成效，但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角度却表明本地区秩序的稳健性。美国在冷战后一直积极推动北约在欧洲以外发挥作用，阿富汗战争可以说北约向外迈出了一步，而今年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再次彰显了此种迹象。

③ [英] 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王生才译：《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 [美] 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了当前东亚地区秩序的羸弱呢?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期发现其中的影响要素。

(一) 一厢情愿的天朝礼治秩序

“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①有学者也将这一秩序称为“朝贡体制”、“册封体制”等^②,笔者认为“天朝礼治秩序”这一称谓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③。在天朝礼治秩序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外围国家则为中国“藩属”。外围国家在名义上接受中国“天下共主”地位,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国家。这种结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各国在“精耕务农,各安其居”的同时,外围国家对中国“遣使朝贡”,中国则要“礼复万国”,双方通过“礼尚往来”,来保障彼此“相安无事”。

天朝礼治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固然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在东亚世界压倒性实力等多种因素有必然联系,但最直接因素乃是中国将自己的政治观念向外部世界的推广和延展。中国政治观念的主流源于儒家,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观念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高低尊卑不同的位置,都有等级之分,上级统率下级,下级从属上级。这与后来西方“生而平等”的观念完全不同。在此信念下,政治最大功能和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按自己本分行事,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④。而等级结构内又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呢?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30页。

② 参见唐彦林著:《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③ 参见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孔子,程昌明译注:《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礼义正名”至关重要，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讲：“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①再进一步，“礼义正名”只有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才能保障整套秩序的稳定。“克己复礼谓之仁”^②，最终每个人的“仁”成为支撑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石，所有问题都要在“仁”字下寻求回答。这样，儒家思想便在理论上将所有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儒家理论反过来指导政治实践，无论是在家、国、天下哪一层次，自然要以人的内心秩序、人伦秩序为同心圆向外推展出去。诚如《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③由此可以说，天朝礼治秩序是当时处于核心地位、拥有绝对力量的中国内政外推的必然结果，这一秩序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一致的。

天朝礼治秩序的稳定效果如何？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国际关系史论者深入研讨。但这里需要提到日本，作为地区第二大国的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始终存有挑战心理和行为，这里有许多史料可做论证^④。这些情况说明，日本在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日本在很长的

①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② 孔子，程昌明译注：《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9 页。

③ 钟雷主编：《大学 中庸 尚书》，哈尔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6 页。

④ 公元 608 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公元 894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官方往来。公元 1281 年元世祖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人转守为攻，开始从海上向中国和朝鲜半岛武装劫掠，倭寇侵扰此后一直延续到中国明朝末年。公元 1381 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日本怀良亲王进行了尖锐抨击：“臣闻之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公元 1592—1598 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被迫对朝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的正面挑战，成为近代以后日本谋求东亚主导地位的滥觞。相关史料可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第 35 卷；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美] 马士、宓亨利著，姚曾虞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历史时期里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①同时也说明，天朝礼治秩序无法撑起“华夏和平”。其中原因“一是中国人显然没有坚强的信念和足够的力量这样做；二是当时的西太平洋地区，除了朝鲜和琉球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需要这样的‘秩序’来推动它的内部发展；更重要的是本地区第二重要国家——日本从根本上反对。”^②

（二）列强分赃的条约秩序

以 1840 年鸦片战争并在战后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英国率先以坚船利炮冲破东亚封闭的藩篱，天朝礼治秩序被逐步打破，开始了此后长达百年的条约秩序。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域内秩序被迫卷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域外秩序，本地区完全跌落为瓜分对象并成为列强秩序中的附属和议题。在“由外主内”的条约秩序下，东亚区域内的日本再度展现自身独特性，成为影响域内秩序全局的独立因素。依据日本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条约秩序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此时东亚区域外部世界由拿破仑战争后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已日薄西山，诸强在欧洲内部大体维持均势同时，重点向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东亚自然成为英、法、美、俄，以及后来新加入的德国等列强争相侵占的膏腴。在西方重压之下，东亚内部出现了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对此历史学家作了种种解释^③，这里不作阐述。总之，此间日本在“脱亚

①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第 36 页。

② 黄枝连著：《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4 页。

③ 相关内容可参见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第 7 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5 页。

入欧”的引导下，迅速吸收西方文明完成近代化，短短几十年内逐步成长为世界强国。与此截然相反，中国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先导，但基本是墨守成规。时为日本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对此曾有评论：“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①

第二阶段为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到“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这一阶段内欧洲强国之间“象征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是特例”^②。美国借此机会开始走出孤立政策，在东亚以“门户开放”为口号攫取自身利益，同时客观上也维持了列强之间的均衡^③。东亚内日本已正式跻身于世界强国并和欧美列强一道掀

① 1884 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列强加紧了对朝鲜的争夺。日本由于在甲申政变中刚刚失败，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但日本统治层认为只有打败中国，才能据有朝鲜。1886 年日本内部出现了“速战”和“缓战”两种意见，黑田清隆主张立即与中国开战，他说：“中国自战法以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而伊藤博文和井上清反对，伊藤遂对中国做了如上评论，全文如下：“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一千丁元左右。若避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直与之和好。我国速筹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井上馨则说：“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详细内容参见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5 页。

② [美]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第 174—175 页。

③ 最能说明这一结论的典型事件为美国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后斡旋两国签订《朴次茅斯条约》。

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日本尽管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但尚不敢彻底打破诸强的均衡。与此相对照，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仍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第三阶段为“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至1945年“二战”结束。“一战”后美国虽未完全摆脱孤立政策，但已逐步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最为显要的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以“十四点”原则构建“一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但“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①。结果如当时英国代表团的尼科尔森所说：“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②在此背景下，美国虽然企图以华盛顿体系将日本维持在均势之下，但日本野心远不止于此，最终走上了武力独霸东亚的道路。中国是抗日的主战场，凭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欧美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要，中国废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并一度跻身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经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③。

在条约秩序下，东亚整体上丧失了自身掌控区域内秩序的主动权，地区秩序被纳入到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框架。欧美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秩序的战和波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东亚地区的战和关系。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固然在于“欧洲人由于在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

① [美]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② 转引自 [美]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6页。